

法律絕非一成不變的「死物」

□余永賢



回歸後香港的普通法沒有發揮活力，隨着國情演化，反而背道而馳，這是一個深層次矛盾。要解除這些矛盾，香港需要非殖民化，需要提升市民對國家和「一國兩制」的認知。司法獨立和法治，是核心價值，但一些言論把這些概念混淆了，必須徹底澄清。

世界上每個國家的法律都需要融合國情。自古至今——摩西十誡、拿破侖法典、大清律例——所有法律都跟當時當地的社會文化息息相關。法律是合情理行為的規限，不能也不可與社會脫節。普通法地區之間也因應不同社會情況而有分別。美國、加拿大和英國文化相近，但也有明顯的區別，例如在土地法上，房屋被視為商品多於家園。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這些前英國殖民地，雖然交通是靠左行車，跟英國一樣，但在法律上有很多區別，因為有不同的文化。

普通法的特點在於可以自行演化。普通法的活力在於可以隨着社會的變更而演化。法律的演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香港由英國殖民地回歸為中國領土是一個瞬間的轉變，香港的普通法要適應這個改變，是一個不輕易的挑戰。

普通法不能完全依靠自行演化去適應社會的改變，很多時需要立法更改。例如同性戀合法化和廢除14歲以下男童不可犯強姦的限制。英國普通法有「國會至上」（Supremacy of Parliament）的原則，國會是法律的一個源頭。

全國人大與「國會至上」原則

基本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第158條訂明：「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也授權香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基本法關於香港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這個授權並沒有令人大常委會喪失解釋權，在需要時人大常委會可以對基本法的所有條款作出解釋。而第158條更指出：「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準。」這樣的釋

法安排完全正常，和英國的「國會至上」原則相約。司法獨立是指法院可以獨立地審理案件。基本法第十九條指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回歸前香港沒有終審權，最高法院審理的案件可以上訴到英國的樞密院。回歸後有了終審庭，加強了司法獨立。釋法對香港法院審理個別案件的獨立性沒有影響。

在法律發展方面，香港實行的法律有三大類：（一）原本的普通法，（二）立法會制定的法律，（三）基本法。司法獨立在第一類體現，香港的法院，一如既往，享有普通法的演繹權。在第二類，香港立法會延用英國國會的習慣，把法律的解釋權交給法院，但若果法院的演繹跟立法原意背道而馳，立法會隨時可以再立法，這就是「國會至上」的原則，法院的獨立性在這方面並不重要。第三類，基本法是國家定立的法律，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這方面的法律發展，香港的法院扯不上任何角色，更說不上什麼司法獨立。

既然釋法不影響司法獨立，又怎會影響香港法院的威信？基本法定下了司法體制，各級法院的權限都有定位，釋法與否不影響這些定位。當然，在基本法施行初期，釋法的需要比較多，而智者問得

巧，愚者問得笨。但如果出了錯誤，就要勇於改過，不應因為面子，禍害香港。釋法是司法體制裡的法定程序，在解決「雙非孕婦」問題上，不需要刻意避免釋法。

普通法也需發揮應有活力

或許一些人以為香港的司法體制可以獨立於國家，從這個角度看來，釋法是對這個獨立性的干預。但是世界上沒有地區的司法可以獨立於國家。香港再不是英國的殖民地，而是中國的領土，所以這種想法完全不切實際。基本法明確定下了香港司法體制與中央的關係，「一國兩制」允許香港有不同的制度，但並不是獨立於國家，這就是「一國」的意義。

一些人危言聳聽，說法治（rule of law）受威脅。有些人心目中只有英國法律，不知道在中國，法治就是中國法律的管治。從香港回歸祖國那一刻，就沒有英國的份。

回歸後香港的普通法沒有發揮活力，隨着國情演化，反而背道而馳，這是一個深層次矛盾。要解除這些矛盾，香港需要非殖民化，需要提升市民對國家和「一國兩制」的認知。法官人選直接影響法律演化的過程，所以法官的任命也非常重要。

司法獨立和法治，是核心價值，但一些言論把這些概念混淆了，必須徹底澄清。回歸後基本法賦予香港終審權，香港享有前所未有的司法獨立。香港法治良好，行使的不是英國殖民地的普通法，而是中國香港的普通法。



不可攀比

黃牛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波日前在接受電視訪問時有關特區政府有必要參與輿論戰的一番言論，立即引起了反對派人士的激烈反對。實際上，在香港的現實條件下，特區政府必須積極參與輿論戰。

一、香港的反對派不是西方社會中那樣擁護現行體制的「忠誠的反對派」。

西方國家的行政當局一般不直接參與國內的輿論鬥爭是有前提的，這就是各政黨之間的政治鬥爭都是在支持和擁護現行的國家體制的前提下，在具體的政策問題上進行的鬥爭。在野黨都是支持國家現行體制的「忠誠的反對派」。而對於反對國家現行體制的政治勢力舉行的政治活動，就不會視為是言論自由，而要通過法律、行政等手段進行嚴厲的限制和打擊。

香港的反對派並不是西方社會中通常意義上的「忠誠的反對派」，他們不但反對中國現行的國家體制，而且也反對香港特區實行的行政主導體制。反對派反對特區政府推行的政策，歸根結底是為反對現行體制這一政治目的服務的。因此，針對反對派對政府政策的批評、刁難，特區政府有必要直接向廣大市民進行宣傳，爭取民意的支持，以民意向反對派施壓，迫使反對派作出妥協和退讓。

二、香港存在較強大的反體制傳媒勢力。

在任何西方國家，任何一家公開鼓吹反對現行體制的媒體都是沒有可能做大，更沒有可能成為主流媒體，因為行政部門、司法部門乃至情治部門會通過各自的渠道對這樣的媒體進行嚴厲的打擊和壓制。

然而，在香港有一大批反對國家現行體制以及香港的行政主導體制的媒體存在，其中的某些媒體甚至成了香港的主流媒體之一，在香港社會具有較大的影響力。這些媒體不但對內地發生的任何事情、對特區政府推行的任何政策都要進行歪曲和攻擊，而且還經常製造各種議題攻擊國家體制和特區政府。在這樣的傳媒生態下，如果特區政府不主動參與輿論戰，不積極團結可以團結的一切媒體，不積極向廣大市民宣傳政府的政策主張，那麼政府推出的任何政策都會被這些反體制的媒體歪曲和抹黑，並誤導市民起來反對。

三、公共政策牽涉社會公眾的切身利益，需要政府積極主動地開展宣傳以獲得公眾的支持。

香港是一個階層分化嚴重，利益集團勢力強大的社會，特區政府推出任何一項政策都難免「順得哥情失嫂意」，都難免有人站出來反對。過去，特區政府對政策的宣導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諮詢多而宣傳少，聽取民意的範圍比較狹窄。多數情況下，只有政府的政策真正制定出來後才會在媒體開展一些宣傳活動，對市民來講這難免有「生米煮成熟飯」，強加於人的感覺。有鑒於此，特區政府推行的每一項政策，從最初的提出相關的政策設想、到具體內容的擬訂和修改、再到提交立法會審議、最後到具體實施等每一個環節都要積極向公眾進行宣傳推廣。這不但有利於聽取民意和吸納民智，也有利於爭取社會公眾的支持，使反對派不敢明目張膽地違背民意來反對政府提出的政策。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積極參與輿論戰，大膽與反對派爭奪民意支持是契合梁振英「適度有為」的執政理念的。這項工作不是哪一個政府部門的事，而是所有的政府部門都要結合自身業務的特點開展政策宣導工作，共同努力為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創造良好的輿論氛圍。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中共領導拒絕極左思潮

□秦曉鷹

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絕大多數是改革開放後接受高等教育並逐級走上最高領導崗位的，這說明他們毫無疑問都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可以相信，中共新的領導人對黨內外那種留戀「文革」甚至否定改革開效的極左思潮，絕不會認同，並保持高度的警覺。因為否定改革開放，就等於否定了他們的生長成才之路。



西方哲學中有一句名言：「存在決定意識」。中國也有一句俗語：「三歲看大，七歲看老」。說的都是人們的經歷、成長時期的環境等等因素，對一個人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影響。普通人如此，政治家也概莫能外。當世界各國都在紛紛預測、評估，甚至猜測中國執政黨新領導人的施政理念和內外政策走向時，筆者以為，通過對中共最高決策層，特別是7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們以往的經歷加以整體性分析，恐怕是得到較為準確與真實的結論的最有益、最簡捷的方法之一了。

經受複雜歷練 具備廣闊視野

從整體上說，中共新領導層成員都經歷過上世紀六十年代毛澤東所發動的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盪歲月；他們都經歷過從「文革」到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轉變；都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30多年中走上了不同的領導職位並且在各種官場戰場中經受了複雜的歷練。

另外，在新當選的7位「常委」和其他政治局委員中，還有一些人的父輩，曾經在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擔任過高級官員，甚至是主政一方的大員。父輩的榮辱興衰會對他們從政後的價值取向產生深刻的影響。對政治家來說，這種家庭式的薰陶是學校的教科書所沒有的，它會使後輩們很自然地喜歡上政治，也很真實地明白：個人的命運、家庭的沉浮與國家的興

亡密不可分。這其實也就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所必須具備的大視野和大局觀的啟蒙。

習近平在不久前與中外記者的見面會上曾經說，人們「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此言一出，立刻贏得了喝彩。這也從一個角度反映出習和他的政治局的同事們的民粹底層意識，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在40多年前被下放到中國農村等最基層的社會單元的那段經歷，使得他們對底層公眾的生存狀況和生活需求有了十分痛切的感受。「那時，我扛着三、四十公斤的麻袋徒步行走十公里的路，是平常小事。」習曾對記者說的這種回憶，在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的早年經歷中並不鮮見。因此，我們也就可以想見，他們一定在施政理念中更加注意民生、更加關注弱勢群體和貧困地區。

改革受益者 清醒認識弊端

從已公布的個人簡歷可以看出，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絕大多數是改革開放後接受的高等教育並逐級走上最高領導崗位的，這說明他們毫無疑問都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衆所周知，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是中共徹底否認「文革」，不斷解放思想，把經濟建設作為黨的中心任務的結果，是不斷清除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工作指導方針流毒的結果。

因此，可以相信，中共新的領導人對黨內外那種留戀「文革」甚至否定改革開效的極左思潮，絕不會認同，並保持高度的警覺。因為否定改革開放，就等於否定了他們的生長成才之路！李克強近日很明確地說：「改革開放就是我們的最大紅利」。從這句很有力度的話中所施放的信息裡，我們已經可以感覺到執政黨堅持改革的決心與自信。

同樣不應忽視，或者說應該更加重視的，是他們在近十多年中在高層職場中的磨練。7

位新常委大多數都曾在中國東部地區工作過，有的還曾在最發達的一線省市身居要津。中國東部中部地區這些年的快速推進，與他們的工作緊密相連。同樣，為使這些地區擔當起中國發展的排頭兵，他們所遇到的困難和阻力，包括國內外的非議也是空前的。創業與打拚使他們更直接地感受到了中國現有體制機制的利弊。他們對影響經濟結構轉型的癥結，對阻礙各類人才成長的不良氛圍，對行政部門不作為亂作為的種種弊端，有着比常人更為清楚地觀察，更為清醒的認知。

知識結構高 認同多元文化

同樣，這種身居高層的經歷，也使他們有機會接觸到了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無論是從為了提高某地的經濟實力和吸引外資的水平，還是隨後以國家領導人「副職」的身份從事外交（包括民間外交）和對外經貿往來，他們與港澳台地區，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與地區都有着廣泛與頻繁的交往。對於今天這個世界，包括海峽兩岸關係，他們的認知都是生動的、具體的、形象的，沒有老一代中共領導人的那種疏離感和陌生感。儘管造成後者與外部世界相互疏遠的主要原因是二戰後「冷戰」導致的畸形的國際格局。

令人頗感興趣的，是中共新領導人對多元文化的認同。這與他們的知識結構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過程有關。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講話時鼓勵中共高級幹部要學習哲學、學習歷史、學習世界歷史就是一例。而對多元文化的認同甚至還與他們的感情生活有關，他的夫人是曾多次在國外演出的一位著名歌唱家並不是秘密。李克強對外文的重視，與他的妻子是頗有造詣的翻譯家也不無關係。

如果了解了上述種種，我們就有理由期待，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在施政理念會變得更加靈活、更加開明、也更加通達人心。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面面觀

□延 靜



11月20日，中日韓三國商務部長在東盟峰會期間宣布，啟動三國自由貿易區談判（FTA），明年一月舉行第一輪會談。對於三國建立自貿區，中國一直持積極態度，但日本和韓國卻各有考慮。這次宣布啟動自貿區談判，特別是在中日關係和韓日關係發展不暢的情況下，無疑是一個新的進展。

中日韓三國都是亞洲的重要國家。去年三國貿易總額達6500億美元，佔世界貿易的五分之一，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但今年以來，日本經濟局面嚴峻，韓國經濟也出現下滑。

韓日各有不同盤算

去年日本發生大地震，經濟出現-0.9%增長，今年以來雖採取了大規模刺激經濟的措施，曾預測經濟增長2.2%，但由於受歐債危機與全球需求不振影響，加之日圓持續升值拖累，日本經濟發展持續不振。不久前《日本經濟新聞》社舉辦日本經濟研討會，多數學者對日本經濟均不看好，認為日圓將會繼續升值，今年經濟增長大體為1.5%，明年預計也會在2%徘徊。

韓國經濟也出現衰退。韓國最大智庫韓國開發研究院不久前預測，今年韓國經濟增長2.5%，對韓國社會將產生不小的衝擊，因為4個月以前曾預測韓國經濟增長3.6%。究其原因，主要是因

歐債危機和世界經濟下滑，致使出口佔GDP50%的韓國經濟增長受到巨大影響。目前歐債危機尚未解決，世界經濟仍有很大不確定性，韓國經濟預計明年兩年增長最多也只能是3%左右。今年1至9月，中韓貿易1879.5億美元，增長3.3%，但增長速度明顯低於去年全年增長18.6%的水平。中韓貿易今年可能難以達到年初所預計的2600億美元。

三國開啓自貿區談判，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日本對外貿易看重中國是它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日本掀起「買島」風波，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導致中日關係發展全面受阻。在此情況下，日本產品在華銷售受到嚴重影響，比如日本汽車今年9月對華銷售比去年同期減少5成，對華出口零部件也隨之銳減。這一情況對日本貿易不能不是一個嚴重打擊。今年1至9月，中日貿易額為2487.6億美元，同比下降1.8%。去年中日貿易額曾達到3400億美元，今年預計將會大幅下降。自貿區談判的啟動，反映了日本官方和經濟界希望改善中日關係以利經濟關係發展的願望。

領土糾紛或成障礙

三國自貿區談判啟動固然是好事，但是否能順暢進行，還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約。當前，中日關係因釣魚島領土糾紛處於低谷，恢復正常恐需相當時日。韓日關係也因為日本官方和經濟界希望改善中日關係以利經濟關係發展的願望，消除疑慮也不是一件易事。口頭上談「政經分離」容易，真正要做到很難。除此之外，對自貿區談判，韓日各自也還有不同的盤算。

韓國對三國自貿區談判基本持正面態度，但更希望今年5月已開始的中韓之間的自貿區談判早日談成。在中韓之間，韓國雖有中國農產品進口的憂慮，但高精深製品對華出口是它的優勢，而且可獲得幾百億美元的順差，而在韓日自貿區談判中，韓國沒有這個優勢，談判一直處於停滯狀態。中韓自貿區談判不久將在中國舉行第四輪，逐步涉及實質問題。

日對談判態度矛盾

日本對三國自貿區談判處於矛盾態度。它的最大擔心是，一旦中韓自貿區談成，韓國高端產品將更多進入中國市場，每年增加200億美元以上，日本產品在華市場將被搶佔。日本同意啟動三國自貿區談判，不無制約中韓自貿區談判的企圖。

中國在與日本的「買島」鬥爭中，已經取得了階段性勝利，為使鬥爭有理、有利、有節的進行，支持中日韓自貿區開始談判，有利於我國經濟發展，也可獲得日韓政府和企業界的支持。建立自貿區會有得有失，但經貿畢竟是相互的，而且這是一國世界潮流。當然，三國談判可能需要相當時日，如政治關係持續不好，也可能是曠日持久的。外電稱，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啟動，是中國推動由東盟、中日韓及印度等國參加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的第一步，以對抗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這一猜測是沒有根據的。

作者為前資深外交官